

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的 **权衡与选择**

JIA ZHI GUAN YIN SU HE
DI YUAN YIN SU DE
QUAN HENG YU
XUAN ZE

张晶 /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JI LIN UNIVERSITY PRESS

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的权衡与选择

——一项关于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军事
合作(1994—2005)的研究

张 晶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的权衡与选择 / 张晶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601-7020-6

I. ①价… II. ①张…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5219 号

书 名: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的权衡与选择

作 者:张晶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丛立新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6.125 字数:160 千字

ISBN 978-7-5601-7020-6

封面设计:刘洛瑜

吉林省吉财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10 年12 月 第1 版

2010 年12 月 第1 次印刷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8499826

网址:<http://jldxcbs.com>

E-mail:jlup@mail.jlu.edu.cn

前言

一、问题的由来

“9·11”之后美国借助反恐之机大举进入中亚地区,不断加大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力度,其中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合作关系最为密切。乌兹别克斯坦积极配合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反恐战争,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等各种便利条件,大力开展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2002年3月,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宣言,从此美乌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军事合作关系迅速升温。但是从2005年春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先后发生“颜色革命”和安集延社会骚乱事件之后(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颜色革命也被称为“郁金香革命”)^[1],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合作随即陷入低谷并濒临破裂。乌兹别克斯坦这个美国在中亚最亲密的战略伙伴首先在7月29日发出最后通牒,公开要求美国必须在半年内撤出驻乌美军基地,然后于2005年11月21日彻底关闭了美军设在乌的汗纳巴德(Karshi-Khanabad)(美国也将其简称为K2军事基地)的空军基地,结束了美军在本国长达四年的驻留,这标志着美乌军事合作关系陷入空前低谷。

美乌原有的密切军事合作关系突然陷入低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对双方合作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分析也众说纷纭。一些学者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和俄罗斯在幕后施加压力促使乌兹别克斯坦改变了策略;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美国正在中亚地区实行战略

收缩;还有学者将其归因于双方合作的意图不一致以及美国对乌缺乏了解……。

以上这些观点固然各有道理,影响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军事合作的因素有很多。但是,笔者认为: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地缘政治、经济)因素是影响美乌军事合作的主要原因,在美乌军事合作的过程中,美国的对乌政策不断在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之间进行权衡与选择,这对双方军事合作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军事合作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乌两国是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美国是实行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典型的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相互制衡,议会能够有效地行使立法权及对总统的行政权力进行制约。乌兹别克斯坦则采取总统集权制政体,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威权主义国家”(authoritarian state)。威权主义又被称为权威主义,“‘威权主义’或‘权威主义’一般指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西方社会科学术语里,人们习惯把政治制度分成三大类别:民主政体、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2]在现代政治实践中,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实际上是民主主义的对立面。在西方学者看来,与民主主义对立的范畴是独裁主义,而现代独裁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权威主义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国家政府经常采用高压手段来维持和执行社会控制,实行家族统治,社会生活缺乏民主。乌兹别克斯坦采取总统集权制的政治体制虽然有其积极意义,“这种政治体制保证了各国过度时期国内的安定和团结,保持了改革政策的连续性,避免了经济形势恶化可能引起的社会大动荡。”^[3]但是它也不可避免的产生消极的后果,总统集权制带来的是总统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总统个人的权力凌驾于立法和司法权力之上,在一定程度上使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的机制减弱,同时也限制了国家法律、法规的正常运行,导致社会生活缺乏民主。

美国政府冷战后开始积极推行民主外交,在海外大力推进民主人权价值观念,日益强调美国的安全应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非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受到了人权价值观因素的显著影响。乌兹别克斯坦是美国眼中的“独裁国家”,其政治

制度和人权状况多次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指责,乌正是美国要实施促进民主政策的对象。同时,美国在中亚也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乌兹别克斯坦又是美国中亚战略中的重中之重,美国也必须重视与乌的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合作关系,以确保其地缘战略利益的实现。所以,美国的对乌政策以及美乌军事合作关系必然要受到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地缘政治、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

与学术界已有的观点不同,本书旨在通过分析 1994 年至 2005 年期间美乌军事合作前后变化的情况来论证,美国对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的权衡与选择是导致美乌军事合作前后发生巨大变化的主要原因。

二、问题研究的意义

关于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合作在 2005 年安集延事件后陷入低谷的原因,国内外学术界的分析可谓见仁见智。总体来看,国内外现有的对于美乌军事合作的研究不仅较少,而且都未将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当作影响双方军事合作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学术界将国际合作研究的焦点都集中在大国之间的国际合作问题的研究上,对于大国与小国合作的研究历来不够重视。相比较之下,对于国际军事合作的研究范围就更加狭窄,已有研究非常有限。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进行搜索发现:在 1999 年到 2007 年期间,国内已发表的以军事合作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只有 60 余篇,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中美、美日、美印等大国之间的合作。在国内已有博士学位论文方面,1999 年到 2007 年已有的以军事合作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只有 6 篇,其中关于中美军事合作的两篇,美日同盟的两篇,俄印军事合作一篇,关于二战时期的军事合作的历史类博士论文一篇。以军事合作为篇名的博士论文只有关于中美军事合作的两篇^[4]。

也就是说,从学术界对于军事合作的研究来看,过于关注大国之间的合作,而大国与小国间的合作则基本上被忽略。象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这样在政治制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国力差距又极其悬殊的“大国”与“小国”之间军事合作的研究则更是现有研究的盲区,这实在是

学术界的一个很大的缺憾。本文则力图对这种缺陷进行弥补,以 1994 年至 2005 年期间的美乌军事合作为例,分阶段研究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在不同时期对美乌军事合作产生的重要影响。笔者认为,本课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它能够在关于国际军事合作的问题上给我们以新的理论启示,使我们充分认识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对国际军事合作进程产生的重要作用。

本课题的研究,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它对于探讨目前学术界所稀缺的政治制度显著不同的国家之间军事合作的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同时,对于今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中国来说,在处理与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的问题时,也能够提供一些重要的政策借鉴。我们不仅要重视国家的地缘战略利益,同时也必须努力消除相互间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的分歧,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际合作。

三、研究现状综述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将价值观因素与地缘因素结合起来研究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军事合作的专著,相关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不多。研究大多涉及的是美国和整个中亚地区国家军事合作的情况,专门研究美乌军事合作问题的比较少。学术界对双方军事合作失败原因的看法不一,在有限的研究美乌军事合作的著述中,学者们或者从美乌自身的对外政策来考虑,或者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因素的外部影响来考虑,或者从双方合作过程中不同的意图及沟通的情况来分析,而且分析较为笼统。

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国内相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不多,还没有专门研究美乌军事合作的专著和论文。研究范围大多局限在美国和整个中亚地区国家的军事合作,对于美乌军事合作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而且相关研究分析都不够深入、具体,都没有将价值观与地缘因素作为影响双方军事合作的重要变量。

国内相关专著有朱成武主编的《十字路口:中亚走向何方》(2007

年),书中分析了中亚国家与美国的关系,认为安集延事件后中亚国家的外交政策出现了理性的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将外交政策改为“亲俄疏美”。作者还认为,中亚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必然会根据所面临的战略形势来调整自己的政策。书中并未具体探讨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对军事合作的影响。

相关专著还有潘志平主编的《“颜色革命”袭击下的中亚》(2006年)。潘志平认为,“颜色革命”使美国与中亚国家军事合作出现了问题,书中重点分析了中亚“颜色革命”产生的原因,认为华盛顿把“颜色革命”引入中亚,没捞到什么实惠,反而惹上麻烦。书中对军事合作问题的分析明显不够深入,没有具体探讨美乌军事合作的相关问题。

张新平在《地缘政治视野下的中亚民族关系》(2006年)一书中探讨了民主人权问题对美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他说:“美国为了把中亚塑造成为符合自己利益需要的地区,自然会继续将西方的‘人权’、‘民主’标准想方设法地强加给中亚各国,他们会利用中亚各国现有的反对派力量,在各国政权交接期间左右各国政权模式向美国及西方认可的方向发展,中亚各国独立后确立的总统制国家体制将面临严重的挑战。”^[5]由于作者的主要研究对象不是军事合作,未能涉及美乌军事合作的问题。

杨恕的专著《转型的中亚和中国》(2005年)一书中在探讨中亚五国对外政策时认为中亚国家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在大国间维持平衡,维护本国利益,不希望任何外部势力在本地区独大。书中未具体研究价值观与地缘因素对美乌军事合作的影响。

王桂芳的专著《中亚战略格局与中国安全》(2004年)一书中分析了中亚国家与美国的关系,认为美国不断干涉中亚国家的人权问题在将来可能成为双方合作的障碍。书中指出,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尤其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体制及其人权状况批评较多,这种因缺乏共同政治理念而导致的政治上的分歧,可能成为美国在中亚扩张的政治阻力。可惜的是,作者并没有对美乌军事合作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孙壮志的《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2001年)一书在分析美国与

中亚国家军事合作存在的问题时指出,美国过分关心中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对中亚国家的援助往往附加政治条件,使中亚领导人十分不满。书中缺乏对军事合作中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的探讨。

在相关研究论文方面,邵育群、潘光等学者在《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探讨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合作和中亚“颜色革命”等相关问题。其中邵育群的论文“美国中亚政策的矛盾与困局”认为,美国在中亚民主和安全利益难以平衡,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存在的错误理念及中亚政策的各目标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布什政府策动的“颜色革命”必将引发现政权及其支持者的矛盾与纷争,加剧中亚地区局势的动荡。潘光在文章中指出,由于美国积极推动“民主改造”、“颜色革命”和“政权改变”,使其与中亚国家的关系由热转冷直至恶化,美国与中亚的反恐合作及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都面临挑战。很显然,这些研究也未能重视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对美乌军事合作产生的重要影响。

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中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概括说来,这些观点或者认为双方军事合作前后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美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在合作过程中自身的因素,如在双方政策过程上或沟通意图上出了问题;或者认为原因主要是合作受到了来自两国以外大国因素的影响,即合作受到了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外部大国因素的影响;或者认为以上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共同发挥了作用。这些观点都未重视人权因素与地缘因素对军事合作产生的影响。

国外学者的第一种观点认为美乌军事合作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两国在合作过程中自身的因素造成的。例如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格里高里·格里森(Gregory Gleason),他将原因归结于美乌双方在军事合作的意图和沟通方面出现了问题。2006年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美乌军事合作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双方合作的意图不一致以及美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缺乏了解与沟通。在2002年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后,“这个同盟所产生的巨大预期既不对称,也不现

实。美国不知道中亚国家对这种干涉没有做好准备,乌方也并不理解美国所期待的目标。”^[6]他认为,美国其实对自己的合作伙伴实际上知之甚少,“美国人由于在克服阻碍了解其合作伙伴的语言和文化障碍方面的无能而普遍遭受非议。”^[7]

有的学者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自身的政策出现了问题。如土耳其学者皮纳尔·埃派克(Pinar Ipek)认为美乌军事合作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自身。她认为,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政府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失败国家”和“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上,但是自从美国军事介入伊拉克后,伊拉克的安全局势始终混乱不堪,从而导致中亚国家对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也失去了信心。^[8]

与皮纳尔·埃派克观点相似的还有美国中亚问题专家玛瑞尔·奥卡特(Martha Brill Olcott)。她认为,美国只打算与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有限的军事同盟关系,这限制了两国军事合作的发展。她认为,美国与乌进行军事合作是有条件的,“美国政府希望与乌兹别克斯坦维持军事伙伴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必须符合美国的要求。”^[9]

学者萨拉姆·阿卡巴扎德赫(Shahram Akbarzadeh)认为美乌军事合作发生巨大变化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政策制定有密切关系。他认为,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在政策制定上的关键因素是“国家利益”以及“政权利益”,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自始至终都决心使用其所有的国家内部和外部的资源来维持政权的延续性,乌政府认识到自己对莫斯科和华盛顿的重要性,从而使自己能够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灵活的选择安全同盟。^[10]

国外学者另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美乌军事合作陷入低谷主要是由于军事合作受到了俄罗斯和中国外部大国因素的影响。美国中亚问题专家阿瑞尔·科汉(Ariel Cohen)在其文章中认为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军事合作关系的破裂主要是由于乌受到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导致的。他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非常能够容忍塔什干的人权状况,两国政府都对乌政府对安集延事件的处理表示支持,俄罗斯对外宣称安集延事件是乌国家的内部事务。安集延事件后不久卡里莫夫总统就访问了中俄两国以寻求支持。”^[11]

美国学者斯蒂芬·布兰克博士(Stephan. Blank)则认为美国中亚政策的失误以及俄罗斯与中国大国因素的影响共同导致了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军事合作的失败。他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在中亚地区面临的战略形势日趋恶化与美国对该地区政策的失误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有关。“只有俄罗斯和中国能够在危机之中决定性的介入乌兹别克斯坦,同时美国却被完全排除在外,这对美国来说是战略性的损失。”^[12]他声称乌兹别克斯坦只听莫斯科和北京的话,并且认为美国政府自身政策的错误导致了美国在中亚地区地位的衰落。他还指出:“美国国务院呼吁将民主和民主化作为绝对和首要的利益,即美国在中亚日程的首要目标是民主,这阻碍了对其它重要问题的考虑。”^[13]

总之,从本课题目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的主要观点是:或者认为美乌军事合作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军事合作受到了美乌两国内部政策过程因素的影响,或者是由于军事合作受到了外部大国因素的影响。

四、研究的方法、基本假设及创新

1. 主要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取历史的方法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来论证核心观点: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的影响是导致美乌军事合作前后发生巨大变化的主要原因,由于美国对人权价值观念和地缘因素的权衡与选择对美乌军事合作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历史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采取的基本研究方法,通过对事物发展历史全过程的研究,更有利于我们把握住事物发展的规律。同样,历史研究的方法也贯穿于整个论文的研究当中,通过对价值观和地缘因素对美乌军事合作全过程影响的研究,我们也能够从中发现其中的规律。其中第一章国际关系中的价值观因素和地缘政治、经济因素,在本章当中重点运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的分析了价值观和地缘政治、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阐述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是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国际合作的重要因素,重点分析了

价值观和地缘因素对美国历届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影响。文章的第二章至第五章则是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将 1994 年至 2005 年期间美乌军事合作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分别具体探讨在价值观和地缘因素的影响下,由于美国对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的权衡与选择,对美乌军事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军事合作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文章在第五章当中采取了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在安集延事件问题上美乌双方矛盾的产生、双方关系的恶化的过程,最后具体探讨导致美乌军事合作关系在安集延事件后濒临破裂的原因。

在理论分析方面。由于主流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合作的分析是有缺陷的,它们的观点都存在着片面性,未能充分考虑到国际合作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这早已成为学术界众多学者的共识。主流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对于研究美乌军事合作的问题存在着不能合理解释的缺陷。本书则力图通过对 1994 年至 2005 年期间的美乌军事合作过程的研究来探讨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对美乌军事合作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本书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紧密围绕着人权因素和地缘因素,将这两大因素贯穿于美乌军事合作过程的始终,分别具体地探讨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在不同的时期对军事合作产生的不同影响,借此总结出关于国际军事合作的更为合理的理论解释,并力图对国际合作理论有所补充。

2. 课题的基本假设

本文有以下两个基本假设:

基本假设一: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进行军事合作的过程中,如果美国在对乌政策中着重考虑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为实现共同的地缘战略目标,双方能够在人权价值观问题上相互让步,那么军事合作的发展将会得到促进。

基本假设二: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进行军事合作的过程中,如果美国在对乌政策中着重考虑价值观因素,在人权价值观问题上拒绝向乌让步,那么双方在价值观问题上产生的矛盾就会严重阻碍军事合作的发展。

文章据此提出本文的核心假设:

国家在进行军事合作的过程中,如果国家在对外政策中着重考虑地缘因素,为了实现共同的地缘战略目标,国家之间能够在人权价值观问题上相互让步,那么将会促进双方军事合作的发展。反之,在军事合作的过程中,如果国家在对外政策中着重考虑价值观因素,那么国家之间在人权价值观问题上产生的矛盾就会严重阻碍军事合作的发展。

3. 课题的创新之处

本文所研究的美乌军事合作的课题,是国家政治制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实力相差悬殊的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本来就比较稀少,而且从总体上看国内外学术界现有的关于美乌军事合作的相关研究,都未重视人权和地缘因素对双方军事合作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本文关于美乌军事合作关系前后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分析与这些观点不同,通过研究有以下方面的创新:

创新一:与学术界已有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地缘政治、经济)因素是影响美乌军事合作的主要原因,在进行军事合作的过程中,由于美国的政策不断在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之间进行权衡与选择,从而对军事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军事合作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

创新二:本文通过研究还能得到以下结论:国家在进行军事合作的过程中,如果在对外政策中着重考虑地缘因素,为了实现共同的地缘战略目标,双方在价值观问题上能够相互让步,那么将会促进军事合作的发展。反之,如果国家着重考虑价值观因素,那么国家间在价值观问题上产生的矛盾就会严重阻碍军事合作的发展。

五、本书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书除了前言部分和结论部分以外,主体部分共分为五个章节。

第一章国际关系中的价值观因素和地缘政治、经济因素。本章共三节。第一节价值观与国家的对外政策。主要写人权价值观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人权价值观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

有重要的影响。第二节地缘政治、经济因素与国家的对外政策,主要分析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充分考虑自己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第三节价值观因素和地缘因素与军事合作的关系。首先分析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合作的理解及其存在的缺陷。然后分别探讨人权价值观因素和地缘政治、经济因素与国际合作及国际军事合作的关系。

第二章美乌关系中的价值观问题与地缘因素。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是美乌关系中的人权价值观问题,首先对美乌两国的政治制度差异的状况进行考察,然后分析人权价值观问题对美乌关系带来的影响以及美乌在价值观问题上采取的不同策略。第二节中亚地区的重要地缘战略意义。主要写乌兹别克斯坦所处中亚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各国都力图扩大在中亚的地缘战略影响。第三节美乌军事合作中的地缘政治、经济因素,主要分析美乌两国出于各自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目标的考虑进行军事合作,地缘因素的影响一直贯穿于双方军事合作过程的始终。

第三章美乌军事合作的稳步发展。第一节美国政府对乌政策的调整。写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在美国中亚战略中地位的上升,美国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对乌政策进行调整,在与乌进行军事合作的同时,对乌促进民主的手段较为缓和。第二节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军事合作的稳步发展。从1994年开始到“9·11”之前的时期,双方军事合作处于稳步发展的状态。分析美乌军事合作的动因、双方军事合作的情况及主要特点。第三节地缘因素对军事合作的影响增大。主要分析双方军事合作稳步发展的原因。美国为确保中亚地缘战略利益的实现,在军事合作的同时,主动减轻对乌在民主人权问题上施加的压力,乌为实现国家地缘战略目标也需要和美国进行军事合作。美乌双方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方面有共同之处,从而使军事合作能够稳步发展下去。

第四章“9·11”事件之后:美乌军事合作的全面发展。第一节“9·11”后美国政府的对乌政策。写“9·11”之后美国对中亚战略进行调整,在中亚实行反恐优先的战略,对乌兹别克斯坦的促进民主战

略向军事安全合作让道。第二节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军事合作的全面发展,分析双方军事合作的动因、双方军事合作的情况及主要特点。第三节地缘因素对军事合作影响的空前加强,主要分析该阶段美乌军事合作全面发展的原因。本文认为,“9·11”后,由于美国对外政策高度重视反恐等地缘战略目标的实现,美乌两国在反恐的地缘战略目标上高度一致,两国对国家地缘战略利益的关注明显超越对价值观问题的考虑,双方能够在人权价值观问题上相互让步,地缘因素对军事合作的影响空前加强,因此双方的军事合作能够获得全面发展。

第五章安集延事件后美乌军事合作关系的恶化。第一节“新布什主义”出台与美国政府的对乌政策。分析在小布什第二任期“新布什主义”出台以后,美国政府对促进民主战略高度重视,以及美国对乌政策的调整及对乌促进民主战略的实施情况。第二节安集延事件和美国的反应。本节通过对安集延事件个案的分析,了解美乌两国在安集延事件的“人权价值观问题”上产生矛盾的过程。第三节美乌军事合作关系的恶化。安集延事件导致美乌两国在人权价值观问题上都拒绝向对方进行让步,双方的关系日益恶化,进而严重影响到双方军事合作的进行。第四节价值观因素对军事合作影响的空前加强。主要分析安集延事件后美乌军事合作关系恶化的原因。文章认为,中亚对于美国的地缘战略地位较以前有所下降,美国政府在战略目标上侧重于对乌促进民主,对乌人权问题的关注明显超越了在地缘战略利益方面的考虑,导致人权价值观问题最终成为影响双方军事合作的严重障碍。

最后是结论部分,对课题的整个研究过程进行回顾,同时包含了本文的核心观点。

此外,本书需要在此对一些问题的补充说明。

首先,由于本文所研究的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中亚地区腹地,美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战略都处于美国对整个中亚战略安排的框架之内,所以书中必然要涉及中亚和中亚国家的概念。中亚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亚学术界主要指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中亚,其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除了当今的中亚五国外还包括与其相接壤的伊朗、

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部分地区,甚至包括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国。书中所说的中亚地区则是狭义上的概念,所提到的中亚国家是指中亚五国,指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即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此外,书中所涉及的中亚地区也是指中亚五国所管辖的领土范围。书中为了行文的方便,将乌兹别克斯坦简称为“乌”,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简称为“乌政府”,其他四个中亚国家也分别简称为“哈”、“吉”、“塔”、“土”。

其次,书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课题所涉及的军事合作的研究范围是在政治制度上存在着显著差异的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所以笔者在文中提出的关于国际军事合作的基本假设和创新观点的前提条件是,合作是在政治制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的国家之间进行的。

再者,虽然除了军事合作以外,美乌双方还有经济贸易等其他领域的合作,但是由于本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美乌之间的军事合作,所以本文将双方其它领域的合作置于次要和辅助的位置进行考虑。

【注释】

[1]“郁金香革命”是指2005年3月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选举过程中发生的反对派发动政变并促使阿卡耶夫总统辞职,反对派上台执政的政治事件。2005年4月11日,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通过投票表决,接受总统阿卡耶夫的辞呈。阿卡耶夫从1990年吉独立后即开始担任总统。直到2005年3月24日被迫流亡俄罗斯。议会同时决定2005年7月10日举行总统选举。此举标志着吉尔吉斯斯坦近1个月的动荡局势基本平静下来。在这次政局变动中,因反对派来自不同城市,却用一个共同手势——握拳表达意愿,握拳形似郁金香花,因此被称为“郁金香革命”。安集延事件在文章后面的章节有详细内容。

[2]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

[3]杨恕:《转型的中亚和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4]这几篇博士学位论文分别是:关培凤,《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和发

展中的地位与作用,2007年,武汉大学。马伟宁,中美军事合作演变及其主要影响因素,2006年,复旦大学。孔晨曦,冷战时期驻日美军与美日同盟研究(1945—1972),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李飞,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研究,2005年,吉林大学。马建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军事合作(1937—1945),2004年,华中师范大学。吴瑕,俄罗斯与印度关系研究,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5]张新平:地缘政治视野下的中亚民族关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44页
- [6]Gregory Gleason, The Uzbek Expulsion of U. S. Forces and Realignment in Central Asia, in Problem of Post-Communism, Vol. 53, no. 2, March/April 2006, p58
- [7]Gregory Gleason, The Uzbek Expulsion of U. S. Forces and Realignment in Central Asia, in Problem of Post-Communism, Vol. 53, no. 2, March/April 2006, p58
- [8]Pinar Ipek, Challenge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sia: What can the United States do?, Journal Compilation 2007, 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
- [9][美]玛莎·布瑞尔·奥卡特著,李维建译:中亚的第二次机会,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
- [10]Shahram Akbarzadeh, Uzbekist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iends or Foes, in Journal Compil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 2007.
- [11]Ariel Cohen, Washington grapples with Uzbekistan's eviction notice, <http://www.eurasianet.org/departments/insight/articles/eav081605.shtml>
- [12]Stiphen . J. Blank, U. 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hallenges to them, U. S Army war college, 2007, p17
- [13]Stiphen . J. Blank, U. 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hallenges to them, U. S Army war college, 2007, p19